

# 多重因素下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成因探究

杨长红<sup>1\*</sup>

(<sup>1</sup>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克什米尔问题是受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从自身来说, 该问题是印度民族与穆斯林民族长期以来对抗的缩影, 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宗派矛盾、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从外部环境来说, 英国的分化政策是催生克什米尔问题的催化剂, 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此外, 克什米尔重要的战略地位则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

**关键词:** 克什米尔问题; 印巴关系; 印度; 巴基斯坦; 英国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1.1100>

##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Kashmir Issu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Under Multiple Factors

Yang Changhong<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Kashmir issue is the outcome of multiple overlapping factors. Internally, the issue epitomizes the longstand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Indian and Muslim communities, resulting from prolonged sectarian, class, and ethnic conflicts between Hindus and Muslims. Externally, Britain's divide-and-rule policies acted as a catalyst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Kashmir issue, exacerbate the severity of this issue. Furthermore, Kashmir'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serves as a practical reason for the genesis of the issue.

**Keywords:** Kashmir issue;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India; Pakistan; Britain

### 引言

克什米尔问题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自印巴分治以来, 两国针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引发一系列争端, 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学界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 如赵克仁<sup>[1]</sup>、孙建波<sup>[2]</sup>、习罡华<sup>[3]</sup>、汪长明<sup>[4]</sup>和姚远梅<sup>[5]</sup>等认为英国是克什米尔问题的罪魁祸首, 张思齐<sup>[6]</sup>、印度学者施里亚·巴克希<sup>[7]</sup>、赛义夫丁·艾哈迈德和阿努鲁格·查克玛<sup>[8]</sup>从印巴自身内部因素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进行考察, 习罡华<sup>[9]</sup>和印度学者穆萨拉特·贾韦德·奇玛<sup>[10]</sup>从地缘政治层面探讨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拟从内外诸多因素出发, 综合探讨克什米尔问题形成的原因。

**作者简介:** 杨长红 (1999-) 男, 贵州从江, 硕士, 研究方向: 世界近代史

**通讯作者:** 杨长红, 通讯邮箱: 1753385265@qq.com

## 1 宗教民族矛盾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内部原因

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攻占信德地区,伊斯兰教从此传入印度。随着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建立,印度正式沦为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国家。与这种军事入侵相适应的是,伊斯兰教在整个印度范围内得到强势传播,并引发印度土著的抵触情绪。

基于伊斯兰教作为征服者入主印度的立场,占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势必会颁布维护本民族宗教利益的政策。德里苏丹时期,王朝改变印度传统的政权形式,采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这就决定了王朝所制定和推行的国家政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经济方面,在征服过程中没收印度教王公贵族的土地和财产,并将其大量分封给穆斯林贵族,穆斯林贵族是国家土地的主要占有者;政治方面,禁止非穆斯林担任国家高级官职,只能担任小官小吏;宗教方面,推行系列歧视与迫害非穆斯林的政策,大量拆毁非穆斯林庙宇,强行逼迫非穆斯林改宗伊斯兰教;军事方面,大量印度教徒为德里苏丹国提供辅助兵源,不能担任国家常备军,发动系列对周边印度土著部落的战争等。<sup>[11]174</sup>这种宗教迫害政策造成克什米尔地区“只剩下十一户婆罗门,其余全部成了伊斯兰教徒。”<sup>[12]</sup>莫卧儿帝国时期,阿克巴以后的继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宗教迫害政策,奥朗则布力图将印度精心打成一个伊斯兰王国,尊伊斯兰教为正统,设立检查制度,限制非穆斯林言论自由,在宫廷习俗中取消印度教习俗,没收印度教寺院财产,恢复对印度教征收人头税,强迫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将大批印度教徒官员驱逐出国家官署和税收机关等。<sup>[11]17</sup>这些宗教政策极大加剧伊斯兰外来宗教与印度土著宗教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使印度教徒确信,在莫卧儿的统治下,再也不可能维护他们的荣誉与自由”,“他们在莫卧儿国家里没有永久的位置,他们的宗教实际上处于危险之中。”<sup>[13]290</sup>这一时期印度教徒发动的萨特纳米、拉吉普特等民族起义即是反抗莫卧儿宗教政策的主要表现。

当宗派矛盾的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便演化成为印度民族与伊斯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自伊斯兰教入主印度以来,双方冲突不断,伊斯兰教向周边印度土著民族部落扩张、王朝后期爆发的人民起义和部落冲突等均是此种矛盾冲突的表现,尤其在王朝后期各地印度教王公贵族的叛乱和印度土著的人民起义最具代表性。马拉塔战争之所以持续20年左右,虽不乏奥朗则布晚年帝国军队的腐化等因素在内,印度教以外的非穆斯林部落军事武装按兵不动,也是造成战争持久化的重要原因,“在奥朗则布去世后的31年间,莫卧儿帝国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有军事价值的印度教部落的援助”,这样的局面无非是自阿巴克以后历代皇帝推行的系列错误宗教民族政策所造成的,“莫卧儿帝国的迅速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直接干涉印度教感情、信仰和习俗的错误政策。”<sup>[13]290-291</sup>伊斯兰国家长期推行错误的宗教政策,造成穆斯林与其他印度土著之间的宗教和阶级摩擦,这些宗教阶级矛盾在此后长期的历史演化中不断积累,并演化为严重的民族矛盾,最终形成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治局面。

克什米尔问题正是印度民族与穆斯林民族长期以来对抗的缩影。克什米尔处在印度北部,较早受到伊斯兰势力的侵略,沦为伊斯兰国家统治的时间却比较晚,直到1322年才被伊斯兰所征服。穆斯林人数在克什米尔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13世纪就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居民,在克什米尔地区人口约有1300万,其中穆斯林占78%,印度教徒占20%<sup>[14]89-92</sup>,其余是锡克教徒与佛教徒,克什米尔成为伊斯兰教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的暴力扩张政策在其中充当重要的角色,故而克什米尔的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当激烈。早在印巴分治之前,穆斯林反抗印度王公的运动层出不穷。印巴分治以后,这种矛盾更是充分地爆发出来,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反抗印度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因此,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宗派、阶级和民族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

## 2 英国分化政策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伊斯兰的长期统治下,也有少数君主推行宗教和睦政策,力图使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友好共处,并且达到一定的成效:“如果没有外来的政治因素的介入、地缘政治的冲突,克什米尔地区民族、宗教冲突,本不会受到外力的诱导,如此迅速地爆发出来,或者说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sup>[2]44</sup>因此,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冲突这个内因外,还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即英国的分化政策。

分化政策在印度的推行历史悠远,自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以来就已存在并不断完善,是英国得以统治印度长达190年的基本政策和重要准则。随着印度教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以及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立,使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以后一度沉寂的民族运动再次蓬勃发展,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加强对分化政策的实施力度。同时,印度国民大会党日益呈现出浓厚的印度教色彩,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对印度的离心力,二者间的矛盾为英国推行分化政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905年,英国将孟加拉省划分为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东孟加拉—阿萨姆省和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西孟加拉省,并对穆斯林作出给予“自从昔日的穆斯林省督和国王们的统治垮台以来未曾有的实际利益”的承诺,使一直处在英国人与印度人统治之下的穆斯林渴望恢复昔日的荣光,纷纷改变了最初反对孟加拉分治的态度,这使得穆斯林与反对分治的印度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渐呈对立之势,并催生穆斯林联盟的成立,使二者的分歧上升成为有组织的教派对立。

继孟加拉分治之后,英国殖民当局于1907年8月提出“单独选举”方案,为穆斯林设立单独选区。国大党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单独选举会导致教派主义盛行,加剧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民族运动势力的分裂。穆斯林联盟则积极支持,在此之前印度实行的是普选制度,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印度教徒在议会与政府中占有绝对地位,分区选举制度的推出,使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看到他们同印度教徒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的希望,进而加强其对于国大党的离心率,正如印度学者潘尼迦所说,“从一九零七年起,印度教—伊斯兰教的联盟是可能的,而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sup>[15]</sup>

在上述事件中,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坚决抵制英国政策的态度,在穆斯林心中造成印度国民大会党积极维护印度教徒利益而忽视穆斯林利益的错觉,如在孟加拉分治时,印度国民大会党基于粉碎英国分化民族主义力量图谋、维护孟加拉地区文化和地域完整性的立场而提出反对,在穆斯林看来他们是出于维护印度教徒利益的目的,“这个政党在本质上还是属于印度教徒的政党,根本不会考虑穆斯林的民族利益”。<sup>[2]289</sup>基于这样的担忧,当英国分区选举方案推出时,穆斯林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这是穆斯林猜忌印度教的突出表现,也是担忧自己民族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心理反映。印度教的教派主义逐渐滋生以及穆斯林对于维护民族利益的考量与担忧,促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淡化。

最终促成二者分道扬镳的是1947年的蒙巴顿方案。方案按照穆斯林独立建国的要求将英属印度分成两个自治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由教派关系上升为国家政府间的关系。然而,英国蒙巴顿方案中对印度土邦的归属原则并未作出明确答复和清晰规定,造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纠纷,尤其集中体现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正如孙建波所指:“土邦归属原则的不明确性和印度对待土邦加入的双重标准是印巴领土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sup>[2]305</sup>

## 3 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

克什米尔战略地位重要,成为两国争夺的主要目标,这成为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克什米尔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克什米尔的地理位置在两国政治战略中均具有重要意义。于印度而言,尼赫鲁一直致力于继承英国在次大陆的遗产,时刻追求印度统一的机会,印巴分治后,印度不断设法削弱、压

制巴基斯坦,从争夺朱那格德到纠缠克什米尔,都是基于这一考虑。另外,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南衔印度,西接巴基斯坦,东部及东北部连中国,北抵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于印度而言,克什米尔地区可以减缓北部的威胁以及西部穆斯林势力的蔓延;于巴基斯坦而言,克什米尔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防线,一旦失去这道防线,将会陷入印度的包围之中,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印巴双方均在克什米尔地区部署大量军队,以确保己方在战略上的优势,形成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长期军事对抗,加大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难度。

其次,克什米尔被赋予的宗教意义对于两国的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国的立国理论方面,克什米尔人以穆斯林为主,于巴基斯坦而言,得到克什米尔是对巴基斯坦建国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巩固巴基斯坦是纯伊斯兰国度的建国理论基础;于印度而言,得到巴基斯坦即可以证明自己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和平共处的天然家园,借此动摇巴基斯坦“两个民族理论”的建国基础,从思想层面抑制巴基斯坦国家的发展。

最后,克什米尔在水源上对两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具有重要影响。西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农业区,其水源灌溉依赖于阿斯河、萨特累季河及拉维河,而这些河流的源头需要经过印度的旁遮普邦,因此,得到整个克什米尔对于巴基斯坦的农业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关系巴基斯坦国家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于印度而言,这恰恰又是削弱、打压巴基斯坦的绝佳方式之一,故印度对此也是寸土必争。

## 结语

克什米尔争端自 1947 年印巴分治,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其间有过冲突,亦有过和平商讨,却都付诸东流,取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这除中间调停国在调停过程中携带某些私心外,更多的是克什米尔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因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除继续靠国际各国人民的协助外,更多的还是依赖于印巴两国自身,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和民族对于对方的态度。希望两国领导人和人民对此做出应有的表态,为实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平的早日到来做出共同努力。

## 参考文献

- [1] 赵克仁. 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由来[J]. 世界历史, 1997(01): 105-108.
- [2] 吕昭义, 孙建波. 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44+289+305..
- [3] 习罡华. 英国撤离印度时期的土邦政策——兼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J]. 南亚研究, 2007(1): 6.
- [4] 汪长明, 高桂林. 印巴分治前后——兼论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政策背景[J]. 晋中学院学报, 2010, 27(05): 97-101.
- [5] 姚远梅. 困境与反应: 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 [6] 张思齐, 唐孟生. 克什米尔冲突中的宗教因素[J]. 南亚研究季刊, 2007(01): 69-74+95.
- [7] Bakshi, Shreya.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Kashmir issue: Genesis to present[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lanets, 2013, 118(118): 2263-2278.
- [8] Saifuddin Ahmed, Anurug Chakma. Kashmir Conflict: A Critical Analysis[J]. Society & Chang, 2012, 6(03): 18-33.
- [9] 习罡华. 地缘政治与 1947-1974 年的克什米尔冲突[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8.
- [10] Musarat Javed Cheema. Pakistan - India Conflic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ashmir[J]. South Asian Studies, 2015, 30(1): 45-69.
- [11] 吴于廑, 齐世荣. 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12] 刘国楠, 王树英. 印度各邦历史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13] (印)爱德华兹. 莫卧儿帝国[M]. 尚劝余, 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90+291.
- [14] Nisid Hajari. Midnight's Furies: The Deadly Legacy of India's Partition[M].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 [15] (印)潘尼迦. 印度简史[M]. 吴之椿, 欧阳采薇,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